

推理美学中的亲情性植入——基于对东野圭吾《湖畔》的研究

李佳颖 朱梦蝶

江苏大学 江苏 镇江 212013

[摘要]以东野圭吾《湖畔》为例，将推理小说置于美学视角下，关注亲情性因素的植入，从结构、视角等角度剖析亲情牵系下的推理美学特征。并从接受美学的满足与突破视角出发，紧密结合现实中的人性问题，透过日本社会的扭曲现象，反思畸形亲情下所背负的原罪，进而给予当代家庭以正确的教育理念启示，探寻帮助青少年发展身心健康的正确方法。

[关键词]《湖畔》；东野圭吾；美学；推理技巧；教育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1.933

《湖畔》以四个孩子的考前集训而拉开帷幕，四个家庭来到湖边别墅，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平静的湖面下实则暗流涌动。东野圭吾在湖面之上巧设逻辑，采取新颖的叙事方式，给予读者探寻真理的刺激感受；而湖面之下的冰冷尸体掩藏着“痛下杀手”的触媒，牵扯着罪恶灵魂的“忏悔”，述说着现实生活中的人性弱点。

一、“湖面之上”的推理美学

从早期的“本格推理”到如今的“写实本格派”，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无论是结构、线索，还是时间设定都愈发成熟，以极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完美融合了“新本格派”和“新社会派”的特征，跃居日本推理小说界的顶尖作家。

（一）双线结构

双线结构的设置在东野圭吾的创作生涯中十分常见，最早见于1990年创作的《宿命》，他将警察和仓勇作的成长道路和被害人须贝正清的谋杀案这两条线索交叉叙述，一改传统单线小说的乏味沉闷。在其2013年创作的《祈祷落幕时》中，东野圭吾依旧沿用了双线结构，在案件之下贯穿着刑警加贺恭一郎和母亲之间的分离，以及浅居博美和父亲之间不得相见的秘密这两条扑朔迷离的线索，共同指向不可思议的亲情羁绊。

尽管“任何一种故事的结构模式一旦被确立，便渐渐会给阅读带来思维的惰性和走势，从而减弱甚至取消读者的想象和沉思”¹，但东野圭吾创作的神奇之处在于，他并行的两条线索彼此之间看似毫无瓜葛，实则总有一个契机或动机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但这一契机对于读者而言是难以发现的。这也恰恰是推理小说极具魅力之处，即充分运用已知来获取未知的愉悦感。在《湖畔》一书中，东野圭吾设置一条线索为别墅区中的四个家庭共同掩饰美菜子杀害丈夫情人的“事实”，他们密谋策划并完成一系列抛尸的过程；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相邻别墅楼里四个孩子与补习班津久见老师为即将到来的入学考试努力奋斗的温馨景象。表面看来俊介情人的死亡与孩子们毫不相干，似乎一切都是家长们犯下的恶行，但事实并非如此。东野圭吾以俊介情人死亡这一案件展开推理，在找寻真凶的过程中，一步步揭露家长们为孩子升学所

做出的“疯狂”举动，用金钱、身体等贿赂修文馆中学的职员，补习班老师正是搭建两者之间的“桥梁”。俊介在被其他人劝说参与了隐瞒情人的死亡、抛尸的过程中，发现诸多不合理之处，逐渐推翻妻子杀人的“事实”，逼迫众人承认了凶手就是四个孩子中的某一个。于是两条线索在此交汇，结构上合二为一，由独立走向融合，实现闭环结尾，带给读者眼前一亮的阅读感受，构思可谓巧妙²。

（二）视角多变

推理视角的选择对于推理小说来说至关重要，读者是否能够调动起阅读兴趣，体会到情节的冲突与悬念都离不开视角的选择设置。推理小说最常使用全知视角，即无所不知的视角类型，仿佛上帝俯瞰全场，对一切了如指掌，包括人物的心理活动等。在《湖畔》中，“除美菜子外，大家的视线又再一次集中在俊介身上。他避开所有人的视线。然后是一阵沉默，只听见细微的蝉鸣”³，此时俊介的沉默表明他已经放弃了和众人关于是否掩盖情人死亡的争吵，内心坚守的道德底线松动，在维护家庭名声还是报警的选择中，他更倾向于前者。尽管东野圭吾并没有对俊介的心理活动进行细致的刻画，但是这个场景全知视角的使用使读者在短时间内知晓了美菜子和俊介两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全面掌握了事件的真实场景，感受到美菜子的茫然无措，也了解了俊介内心的纠结苦恼。在全知视角下，人物的内心活动依旧袒露在了读者面前，丰富了读者的心理空间。此外，尽管是在全知视角的大框架下，但东野圭吾作为故事的叙述者采用视角变换，给予读者观察现场布局以及所有人一举一动的机会。上述文段中视角发生两次变换——美菜子的心理活动转向俊介的心理活动，读者跟随众人的视线从美菜子身上掠过，转换自然。

全知视角在提供更多信息的同时，也剥夺了读者的自主阅读权力，读者只需被动接受文本信息即可，降低了读者对作品的参与度²。因此除全知视角的使用外，《湖畔》中，东野圭吾选取俊介这一人物作为固定人物视角，死者本身就是俊介的情人，“杀人凶手”是俊介的妻子。整本书中并没有出现侦探一角，东野圭吾将侦探平常化，打破传统的神化，此时的俊介担任书中的“侦探”，扮演着重要角色，读者跟

随俊介的视角在一步步接近死亡事件的真相。死者拍下的重要照片、失而复得的鞋子、地毯上的“血迹”成分、停车场的车子、湖畔的小船等等，这种种细节都暗示着妻子是凶手的这一论证存疑。在小说结尾处，东野圭吾以俊介视角与众人再次展开激烈的“对决”，一切疑点的提出迫使藤间承认“凶手就是孩子”。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既有全知视角的高屋建瓴，也有固定人物视角的限制，二者交替使用，相互配合，弥补视角缺憾，使读者徜徉在精妙绝伦的逻辑世界中。

二、“湖面之下”的亲情植入

（一）期待视野的满足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活动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其在讨论文学的社会功能时，读者这一环更不应被遗忘⁴。上文提及的视角多变特征在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犹如上帝的“全知视角”满足读者内心的好奇与窥探，“固定人物视角”则进一步冲击读者的“期待视野”，使其获取意料之外的关键细节信息，增强推理小说的逻辑感。此外，读者“期待视野”的满足更在于作者在作品中植入的社会性因素，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聚焦大众感兴趣的社会热点话题。东野圭吾“写实本格派”的鲜明特征之一在于犯罪动机的设计，其所揭示的动机往往与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相连。在《湖畔》中，四个家庭就是因为孩子的升学问题聚在一起，父母们期盼子女考上修文馆中学，不惜牺牲一切。正是因为“亲情”这一关键因素的植入，使得《湖畔》的推理过程由一种推理逻辑而升华为一种推理美学，其小说语言平实细腻的同时又不失真实感。

（二）亲情悲剧的推理美学终结

书中父母在升学主义的压力下过多地对孩子的学业进行干预，不顾孩子的想法，独断专行，最终只得到了孩子的恶意外反扑。凶手是四个孩子中的某一个，也许是偷听到俊介情人威胁到升学考试的事情，也可能只是单纯地想将父亲从情人身边抢回来。每个孩子看似都有作案动机，但家长们都无法肯定自己的孩子不是凶手，于是选择合作将尸体沉入湖底，这样的做法最终将双方都推入了道德的深渊。书中这些平日最自然的亲情实则过于自私、过于狭隘、过于武断，从而将至亲之情扭转为一种基于互相伤害的原罪，而这种扭曲的亲情之爱在推理美学的意象化矫正之下，逐渐形成了一种规训心灵的光影映像，它昭告着世人要在道德、法律与伦理秩序的范畴内求得心理与心态的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不免会影响家庭结构，但作为家庭伦理的核心即亲情关系不应改变。父母、子女之间的爱皆出于真情实感，是一种天赋德性，而如何在个体独立性与家庭亲和性之间求取平衡，如

何在正义与道德的原则下满足自身的欲望是父母与子女都需思考的问题。

书中日本家长的育儿方式也给予了中国式教育一定的反思，他们在死亡事件发生后完全不与四个孩子沟通，对自己的孩子并不信任。在如此畸形的亲情下，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及陪伴存在严重的问题。跳出日本社会的禁锢反思我国的育儿现状，不难发现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就有相关研究指出：父母陪伴对儿童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较高水平的父母陪伴能帮助儿童接纳自我，正面肯定、评价自我⁵，从而满足儿童爱和尊重的需要。但在2000—2017年的《中国教育报》中，“教育焦虑”“过度陪伴”等现象不断出现，亲子关系随之愈发冷淡，父母究竟该如何陪伴子女的问题愈发难解。实际上，父母不同的陪伴方式会对子女产生不同的影响，不论精神还是物质上，父母都需选择确定有效的陪伴方式，加强自身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系，同时家庭应与学校、政府和社会共同合作，发挥父母陪伴育人的最大功效，促进儿童的良好发展。

结束语

东野圭吾《湖畔》围绕“畸形亲情”展开，以双线结构、多变视角的设置带给读者逻辑推理的乐趣，感受推理美学的奥妙之处，同时通过狠辣的社会剖析和戏谑的讥讽揭露亲情背后值得反思的人性问题，给予当代家庭教育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格非. 小说叙事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 [2] 潘馨. 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叙事研究[D]. 山东大学, 2019.
- [3] 东野圭吾. 湖畔[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7.
- [4] 钱莉. 《大侦探皮卡丘》的接受美学分析[J]. 电影文学, 2019(22): 138-140.
- [5] 邓林园, 李蓓蕾, 靳佩佩, 许睿. 父母陪伴与儿童自我价值感的关系: 城市与流动儿童的对比研究[J]. 教育学报, 2017(5): 71-78.

作者简介:

李佳颖, 女, 生于2000年7月, 汉族, 江苏盐城人, 江苏大学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汉语言文学

朱梦蝶, 女, 生于1999年9月, 汉族, 江苏常州人, 江苏大学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汉语言文学(师范)

基金项目: 江苏大学2021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 202110299656X